

2004. 2

(总第一百零二辑)

要 目

- 我和中国上古史研究
- 笔墨回首一生路
- 严斐——情思漫漫忆华年
- 我所知道的“小站四清”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102辑. 2004年第2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1-03546-0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578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字数:150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7.5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4·2(总第102辑)

史海扬帆

- 忧患满怀探径勤..... 杨生茂(1)
- 我和中国上古史研究 王玉哲(21)
- 吾师玉哲翁 梁吉生(40)

金融精英

- 毫厘回首一生路..... 刘续亨(43)
- 我所知道的中国第一家保险机构
- 太平保险公司 张澜生(54)
- 张章翔:在津从事金融事业40年的宁波人
- 张章泳 张万骥(63)
- 记父亲林鸿赉在天津中国银行..... 林 放(73)
- 韩天耀——献身祖国的金融事业 李民强(86)

收藏岁月

他将美音留人间

- 记胜利唱片公司经理师子光先生 师静淑(95)
- 收藏唱片四十载 常兆新(117)

艺苑春秋

- 严斐——情思漫漫忆华年 文 淑(133)
- 忆魔术大师陈亚华 陈敬福(146)
- 我的曲艺创作之路 萧作如(159)
- 刘俊英——“小百花”的台柱子 甄光俊(171)
- 父亲高少卿的司鼓生涯 高 峰(184)
- 把毛主席逗乐的河北梆子演员陈克武 童 稚(188)

非常人生

- 我所知道的“小站四清” 王 辉(197)
- 我在“文革”中保护文艺界老干部 滑富强(219)
- 封面照片说明 (94)

忧患满怀探径勤

杨生茂



杨生茂教授在家中(摄于1994年12月)。

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话，
可能不会有现在这种固执、自矜和恶俗，
而民族忧患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
至于个人，毕竟是沧海中的一粟。

这首《咏忆》是我几年前的小作，小诗中强调的那种情感和那种忧患的意识，是我一生思想的主线。这首诗照亮了我迄今八十七年的人生，早已溶化在我的血液中，指导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一、早年充满忧患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于1917年9月26日，河北省涿鹿县人，字畅如。早年的生活历程，无非就是求学。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我的学习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塾；第二阶段是正规的学校；第三阶段是解放后的教与学。第一阶段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而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的。

七岁时，我入私塾，读了四年书。老师是个冬烘先生，仅让学童背诵，从未“开讲”。我虽然每天上下午各背一遍书，但由于对书的内容不大了解，念起来味同嚼蜡，至今大部分印象不深。

四年间念了些旧式书馆习读的书籍，从《三字经》等一般初级读物，到《论语》、《左传》、《诗经》、《礼记》等典籍。但至今仍能朗朗上口、背诵如流者都是些写人、写景、写物的比较生动的诗文。凡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类大道理的文章，则所记无几。有时我感到封建主义道理记得少些可为庆幸之事。这是自我陶醉的想法，因为在四年死记硬背的书斋生涯中，思想上不可能不受封建礼教的熏染。

童年记忆力强，故在古文方面多少打下了一点基础。离开私塾后，能集中时间去学习古文的机会就不多了。

由于老师不是旧学科班出身，对于文章程式的要求不严，学生在行文结构方面能得以自由发挥。虽然为文并不得“体”，但无拘无束，反而易于发展文思，锻炼笔锋。

在最初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左传》、《千家诗》这四本书对我影响最大。长期诵读古文，自然培养了我很好的语言感受及运用能力，也让我记住了许多历史典故。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增加，渐渐地理解了书中蕴含的道理。

十一岁时,我进入高级小学,乡人称之为“洋学堂”。这是另一个知识新天地。那时的学校,注重讲授西学,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教学方法也有所改变。在生物课上,老师让学生观察昆虫,使学生耳目一新。英语老师哇啦哇啦地念外语,也让我觉得怪有意思的。时值北伐之后,关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小学生全不知晓,只记得经常参加“提灯会”,晚间擎灯游行,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的正义歌。

当时课外活动较少,最吸引人的无非是听书和看书了。每当县城来了云游四方的“说书人”,我每场必到,风雨无阻。听《七侠五义》、《彭公案》、《隋唐演义》,常常为历史人物的豪情壮志、仗义侠情所感动,并找了《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来读。

上初中后,我接触的第一桩新事物是学校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有许多新文化运动早期的作品。我十分欣赏鲁迅的小说,也喜欢郁达夫和冰心的诗文,因当时年龄尚小,还不能完全了解其社会意义,但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却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引发了我对封建制度的痛恨和反感。

课堂上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历史。历史老师着重讲中国近代史。近代史是中国受外国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在学习中,使我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憎恨外国侵略者的思想,以及为中华民族图富强的愿望。

1934年我进入北平高级中学。这时,随着日军逼近华北,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更加蓬勃。主要受形势的推动,我也参加了罢课运动,一二·九进行示威,也因挨过警察的棍棒而受伤,但当时还受着“学而优则仕”以及“扬名声、显父母”一些封建意识的束缚,在同学中基本上属于死念书类型的学生。我有时到东安市场去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进步的书刊,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等。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探求救国道理,是这一时期我求学经历的一个重要特点。

1938年,我考进燕京大学。这所学校是1916年到1919年间,由汇文大学堂与潞和书院两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此时它是日军占领华北后,北平仅存的两三家教会和私立大学之一。当时校园内外的社会政治气氛反差极大,不无寄人篱下之感。每当我站在燕京大学的门口,心情异常烦闷。校门内是美国教会的领地,校门外是日军的天下。



杨生茂青年时在

夏威夷留影(摄于1941年)。

1941年秋在同学和教师的协助下,我赴美学习,进入了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到美国后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后来得知,我所乘坐的轮船,是战争爆发前去美国的倒数第二条船。

这期间,我为了谋生到处“打工”,这样也有了较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机会。尽管这种“接触”是浮浅的,但多少尝到一些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我为中心”的冷酷无情的味道,也感受到中国人所受的不公正的种族歧视。当时痛感因国弱而遭凌辱之苦,对于国民党丧权辱国和腐化的行径,亦怀恶感。解放后,每当读到海外侨胞对于新中国成立所受鼓舞的报道深有同感。他们殷切企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后来我参加编写《美洲华侨华人史》一书,也是从这种感情出发的。

1944年我自加州大学毕业后,转到斯坦福大学研究院,主修美国外交史。导师托马斯·贝莱学识渊博,可算是美国有名的外交史学家之一。他以利己主义作为估量美国外交活动的惟一尺度,将强权政治和使命观熔于一炉,构成他的外交史学的基本体系。我钦佩他治学勤奋的精神和博闻强记的才能,但对他所持的

观点不敢苟同。在当时他所写的教科书上,记下了我不少的尖锐评语。1946年,美国的报纸上正大力宣扬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提出的援蒋拨款议案。这种宣传,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势,也符合贝利的一贯主张。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给贝利写了我离美前夕的最后一封信。我在信中明确指出:援蒋一举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事情,中国人民是不会原谅美国的。我想,这一封信是我交给贝利许多读书报告中最好的一份。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经常关心国内政治,关心抗战形势。常常翻看史沫特莱、斯诺等新闻记者的报道,也时常阅读《亚美》等同情中国抗日的进步杂志。特别对八路军、新四军艰苦抗战的事迹,深感欣慰。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成立大会时,得知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惟一代表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九个官员共同参加会议。殷切希望了解国内情况的我感到非常兴奋,同一位华侨同学商量后,决定以《中西日报》(华侨报)记者的身份,对代表团进行采访,董老欣然接待了我们。董老生动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这次谈话对我来说,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政治教化。

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常常思考中国积贫积弱、长期被列强欺凌的原因。来到了美国,我有意识地去寻找美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目的的根源。在加州大学,我选定历史学作为专修科,也选学了政治系、经济系、国际关系学系、新闻系的一些课程。除了解有关欧洲的历史、史学方法论之外,我还着重学习了美国通史、美国文化史、美国社会史、美国与第一次大战等课程。到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后,我主修美国外交史。对美国史学家片面强调本国利益的程度有所了解。

二战结束后,我游历了美国东部的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在参观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新成立的联合国后,回到祖国。

1946年初回国后,在家中赋闲待业。在此期间开始撰写国际

评论性文章,至1949年底一共撰写了四十余篇主张“中立外交”的文章。

1947年秋我来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年三十,是南开大学复员后,南开文学院第一个从国外归来的青年教师。

一年后天津解放,在我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在学习,自觉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源于旧社会积累起来并在历史中得以加深的两种思想:一是民族感情,二是社会进步观念。历史能使人产生进步观。有了这种进步观,自然会意识到社会主义不但绝对超过封建主义,也优于资本主义。

在教课的同时,我也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1950年下半年,我与其他六位同事一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杂志。这本刊物,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创办的教学参考读物。1952—1953年,我在北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此后的一生中,我都在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用这些方法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着手南开美国史的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世界史研究这个领域从事耕耘的中国学者很少,只在南开、北大等几所大学开设了西洋史课程。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批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成为高校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力量。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我先后开设了苏联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等课程,建国初期还曾在天津电台开办讲座,讲授世界近代史。50年代中期,我和另外几位史学家一起,合编了高中《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及与这两套教科书

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为了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组织编写了《世界历史小丛书》,我被聘为编委会委员。此外,我和另一位学者编写的大学教材《世界通史(近代史部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一再重印,1987年还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高校教材一等奖。从1959年开始,我着手培养世界近代史研究生。

1964年国务院出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考虑,决定在有关高校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我承担了在南开大学组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图书资料的引进。经过大家长期努力,使得美国史研究的外文文献不断增加。当时确定美国史研究的重点是美国外交史、美国黑人运动史与美国工人运动史。

“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室的所有工作都被迫停止。“文革”后研究室开始重建。我再度承担了研究室的组建工作。中美建交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遇。

研究室自成立始便树立起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在为文时,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先后开展了专题性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主持编辑了美国外交史专题资料集,这些工作为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研究室逐渐具备规模,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和译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使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始终保持在先进地位。

“文革”后,我始终以澹泊惜阴自勉,以忧患意识自励,婉言推辞了许多会议和职务,专注于美国史的研究工作。“文革”后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特别是随着年事渐高,求医问药、跑医院成为常事。但只要我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就会立即投入工作。我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评议组历史学分组成员(1986—199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组成员、中国美国

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美国史博士生导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史杂志》(美国)特约编辑、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等职。

我在致力于美国史研究的同时,也与国内国际学者经常交流信息,讨论问题。1979年,我和国内其他美国史专家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这对我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2年二三月间,我与几位同志访问了英国和希腊。时间很短,两国各为二周,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在英国,参观了伦敦大学的勃克贝克学院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约克大学历史系、爱丁堡大学历史系及伯明翰大学历史系;会见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部分讲授历史的教授。在希腊,访问了雅典大学历史系和塞萨洛尼基大学历史系。希腊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正在为振兴民族文化,发扬悠久的文明而努力;英国是一个垂老的近代帝国,它在新时代的挑战面前,正在应付政治和经济上许多严峻问题。

对于英国启发学生主动精神,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教学方法我很认同,并认为我国也应学习。希腊、英国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组织方式,也给了我许多启示。同年7月我赴日本,参加的“美国史研讨会”。1983年9—11月,我还应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知名学者交流项目”邀请,赴美访问明尼苏达大学和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1987年5月我参加“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4月参加“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会”、“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学术会议。

三、我的学术研究

严格来讲,我是在美国开始外国历史学研究的,60年代开始,

我专注于美国史的研究。1961年发表了《“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这个题目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揭示肯尼迪的“新边疆”的政治涵义。改革开放以前，美国史研究在我国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美国史研究的形势更加紧迫，任务更加繁重了。随后我撰写了《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等有关美国外交史和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作为历史工作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国人了解美国的过去。我认为中国人研究美国史不仅是温故知新，还在于温故而知彼。我们了解了美国人是怎样通过扩张主义使命观进行外交活动的，这就会对我们与美国交往，及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有所根据。于是，我开始系统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1991年底推出了由我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一书。在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同时，我还发现，国门刚刚敞开，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外来事物，对外来事物感到新鲜，并片面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不少人主张全盘吸收。如何筛选吸收外来文化，以弘扬中华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问题，引发了我选择美国史学史为研究对象。自此我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史学史的论文和著作。

写《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目的，无非是要客观地揭示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我认为，扩张主义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年)、海外扩张时期(1898—1945年)和全球称霸时期(1945年—现今)。从三大分期的角度看，美国外交政策上有三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策口号：一是孤立主义，二是“门户开放”，三是承担义务。三者都是为扩张主义服务的。孤立主义基本是大陆扩张时期的指导思想；“门户开放”是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承担义务是为了全球称霸战略而制定的。

解放前，中国并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翔实系统地介绍

美国外交史方面的专著,我和其他的美国史研究方面的学者,都是以美国编写的外交史作为主要参考书。经过研究,我发现,美国外交史学者大多从本国的狭隘利益出发,很少去研究外国的具体复杂的社会实况。他们很少研究霸权主义的性质,而只是注意这种政策的目标、方式及对本国利益的关系。他们在学术上的一个通病是,不愿追究本质性的内涵,而偏重叙述和描绘表面现象。在研究中往往见木不见林。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确定为“扩张”,是我对美国外交史一贯的看法。

说得平淡一些,我们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几个中国学者用中文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教科书,是为了向阅读外国学者所写教科书的中国学生提供一本对比物”。在审视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方面,中外学者自有相似之处,肯定也会有大量不同之处。写作的目的在于增进学生在读书时进行鉴察辨别、筛选吸收。在书后所列中文著作中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不尽同意,这也有点“百家争鸣”的意思。

一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者来南开,他诧异地问:“研究美国史做什么?把美国人写的翻译过来不就得了?”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人应该自己研究美国史,应该发挥中国人独立判断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出为我所用的史学研究成果。

研究外交史要以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审视和对比的基本尺度。虽然只要“国家”这种政治现象存在,国家利益就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但不应损人利己。若以性质去审视,反对侵略和压迫的政策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写美国外交史,应掌握是非观念。

美国扩张主义的基础是使命观。使命观发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到19世纪40年代,这种宿命论发展为大陆扩张理论——“天定命运”;在19世纪末开始的海外扩张高潮中,又掺进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新天定命运”说;二战之后,结合全球称霸,又以“承

担义务论”的面目出现。这些“理论”虽在解释上因地、因时、因事甚至因人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经济是外交政策的基础,政治为经济服务,一切口号都是服务于政治的。

美国认为自己在外交事务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表现为颐指气使,设法驾驭别人。美国利用人权字眼作为它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手段之一,在道德评价和外交政策中推行双重标准。对别国的人权问题妄加批判,对自己的人权问题置若罔闻。

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使我深深地感到,对历史研究者的培养和成长来说,史学史是一门必修课,在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美国史学家的深入剖析。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较快。在内容方法上改变很多。就方法而言,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就研究内容而言,社会史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对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旧的历史学和史学方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吸收新的史学方法的同时,大力发展我国传统史学的优势,实是当务之急。

研究外国史学史是为了“外为中用”。特别要注意我们的某些有价值的史学方法论。通过批判吸收,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丰富我们传统的治史与传授知识的方法。换句话说,既要“引进”,又要消化。只“拿来”不消化、不对比,就不能为我所用。“拿来”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消化和创新,弘扬我们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要正确对待我国的文化传统,我们要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不仅吸收外来文化积极的成果,还需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缔造。

对外来文化,必须采取鉴别吸收、学以致用态度。美国立国较晚,历史不长,并且长期受实用主义影响,不太注意史学研究。美国史学理论大都源于西欧。研究美国史学史,我选择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来梳理美国史研究演进的脉络,来解析史学流

派的形成、史学思想的兴替、史学社会功能的变化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史学也是在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出鉴别吸收的重要性。

对于评价历史学家的标准,我认为每位史学家都应是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楷模。史学大师在史学研究中的共同显著的特点是,都回顾了过去的历史,从中吸收我们认为有价值的遗产,并经过消化,提出了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影响的论点,并对未来提出启迪性的看法。他们直面社会,意气风发,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对当代人起到激励、鼓舞、启发、反思的效用。

就我所厘定的标准言,班克罗夫特、特纳、威廉斯是美国三个杰出的史学家。从社会发展角度,把这三个历史学家联系起来,即可概括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在他们三人以外,若再加上两位重叠前后的过渡性史学家,即19世纪末的亨利·亚当斯以及二次大战前夕萌发并至战后盛行的“一致论”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特廷,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就更加清晰了。

扩张主义使命观是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走向。这自然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成为民主党人。在19世纪上半叶得克萨斯和俄勒冈并入美国版图,美墨战争又扩展了西部边疆。一连串显示“显明天命”的政治运作驱使着民主党人,其中包括班克罗夫特。

班克罗夫特处于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节节挺进,自由资产阶级在年轻的共和国里赢得丰硕果实。班克罗夫特出生前十多年,美国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告胜利结束;在一生过半时,另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吹奏胜利凯歌。

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生活于同一时代。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西欧,社会矛盾日益深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而班克罗夫特生活在美洲国度,资本主义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真正的辉煌甚至还没有到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预见了资本主义末日的命运,而